

列宁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创造性探索

□ 何海根

十月革命胜利后，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条件下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苏维埃俄国面临的最根本的任务。1921年3月列宁主持召开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正式宣布放弃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改行新经济政策，对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创造性探索。用列宁的话来说，这一探索，意味着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后果

1918年春天，美、英、法、日、德等帝国主义国家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进行武装干涉，俄国国内的反革命势力也趁机发动叛乱，在这种极端危急的情况下，列宁宣布“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提出“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口号，把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转入战时轨道，动员国内一切人力、物力、财力保证战争需要，实施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施，对于粉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保卫和巩固新生的

人民政权，起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不仅是战争时期采取的临时措施，而且是苏维埃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制度构想。十月革命胜利后，当时世界上还没有可供借鉴的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包括列宁在内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并不是很清楚，他们能够参考的只有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对未来社会的一些基本设想，例如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等。之所以将这项具有“战时性”特点的政策冠名以“共产主义”，是因为它也是苏维埃政权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种尝试和具体措施。因此，到战争基本结束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仍在继续实施。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触犯了农民的经济利益，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21年春，全国普遍发生了饥荒，农民自发组织了暴乱，把目标指向苏维埃政权。此外，在十月革命中非常支持布尔什维克的彼得格勒普梯洛夫工厂的工人举行了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和增发粮食。可以看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引发了全面危机，严重威胁到俄共（布）的执政地位。

转向新经济政策

苏维埃俄国面临的严峻形势说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损害了工农群众利益。面对这种情况，列宁开始进行反思，他说，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因此，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准备停止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通过了《关于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等一系列重要决议，作出了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决定。根据新规定，粮食税的数额比余粮收集制的数额要低很多。这样，农民在交完税以后就可以自己支配余粮和其他农产品，进行自由买卖，用来交换生活必需品和其他农产品。

政府允许农民将余粮和其他农产品或者手工业品拿到市场上自由交换和买卖，就相当于恢复了商品经济和自由贸易。因此，新经济政策提出要大力发展商业，充分利用市场和商品货币关系，促进工农业产品的流通，以满足城乡居民的生活需要。列宁还号召共产党人要学会管理经济，学会文明经商。在所有制方面，新经济政策改变了国内战争时期关于工业企业普遍国有化的做法，允许私人经营企业，并且将一部分国有化了的企业退还给原企业主，由私人经营。国家还采取了租赁制等措施，将一部分企业出租给私人经营。列宁还提出可以通过租让制的方式将国内企业出租给外国资本家经营。

到1921年10月，新经济政策基本形成。概括地说，除了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和特点包括：允许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并存，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通过国家资本主义来利用、限制资本主义经济成分；通过合作制将小生产者引到通往社会主义

的道路上；允许国家调节下的自由贸易；强调社会主义国家要同世界发生联系，利用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来建设社会主义，其中包括外国的资金、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以此来恢复和发展大工业生产，加快经济建设。

从1921年下半年开始，由于新经济政策的作用，苏俄的国民经济开始全面恢复。农民可以自主种植、自主支配税后农产品后，积极性被调动起来，播种面积因而扩大，全国的粮食和农产品产量迅速增加，饥荒问题得到初步解决。随着商品交换和流通的活跃，市场也繁荣起来，工人、农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明显改善，对布尔什维克党的不满也消除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瞿秋白1920年至1922年在俄国工作和生活，正好经历了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对于新经济政策的效果，他曾生动地描述道：回忆二三月间，我到俄人家里，黑面包是常餐便饭唯一的食品，现在丰富多了，可是非得有钱不可，市场物价因投机商业之故很不稳，然而大概而论，大多数劳动人民也受许多方便利益。列宁在出席莫斯科苏维埃全会时也充满豪情地说：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

“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

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苏维埃政权在采取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尝试失败后，转而利用商品、市场、外资等方式来巩固苏维埃政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用列宁的话说，这是一种“迂回过渡”的方式。列宁的探索表明，无产阶级政党的生命力和社会主义的前途，不在于照搬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而在于从实践中不断认识和总结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1924年列宁去世之后，新经济政策继续实行，但不久党内就发生了关于新经济政策的争论，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苏联工业和农业集体化运动开始铺开，新经济政策就基本停止了。出现这种情况，从主观上看，列宁认为新经济政策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远构想，而斯大林并不这样理解；从客观上看，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规模空前的经济危机，德、意、日法西斯分子相继上台执政，苏联必须采取一些“非常措施”更快地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

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思想，从宏观上回答了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1985年，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这里所讲的“列宁的思路”，就是指新经济政策。



贞观之治与《群书治要》

□ 刘余莉

《群书治要》是唐太宗在贞观初年下令编纂的一部典籍，汇集了唐朝以前经、史、子之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精髓，是创建“贞观之治”的思想理论基础。

中国传统治国理政思想的精华

《群书治要》是魏征等社稷之臣从唐前浩如烟海的典籍之中精选的六十六部典籍中撷取最精粹的治国理政智慧，汇集而成，其内容涵盖“五经”（诗、书、礼、易、春秋），“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和《晋书》，以及诸子百家，如墨、道、法、农、兵家等。所以，称它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毫不夸张。尤为可贵的是，《群书治要》摘录的少数原著在五代之后就已失传，唯有《群书治要》保留了其精华内容，如《尸子》《昌言》等，这使《群书治要》具有更加重要的价值。

唐太宗为何要编纂《群书治要》

唐太宗从十几岁就开始带兵打仗，当上皇帝时才才二十几岁，对于治理国家，积累显然不够。因此他迫切希望学习古圣先贤治国理政的智慧。

《贞观政要·论政体》记载，贞观初年，唐太宗对萧瑀说：“朕从年轻时就喜欢张弓射箭，自以为懂得识别弓箭的好坏。近来得到十几把良弓，于是拿给弓箭师傅看，结果他却说，这些弓都不是上好的良弓。我询问原因，弓箭师傅说，木头的中心不正，就使木头的纹理歪斜，这样的弓虽强劲有力，但射出的箭不直，所以不是上好的良弓。从中，我领悟出很多道理：我是用弓箭平定天下的，一生所用弓箭已经够多了，但尚且不懂识别弓箭的要领。而我得到天下的时间很短，对于治国的道理，肯定不比我对弓箭的知识掌握得多。我对弓箭的了解尚有偏差，更何况掌握治国的要领呢？”

从此，唐太宗定期召见五品以上的京官和中书省的官员，向其请教古圣先贤治国的智慧，并仔细询问宫廷外面之事，以对百姓疾苦和政教得失有详细了解。

贞观二年，唐太宗问黄门侍郎王珪：“近代帝王和大臣治国多半不如古代，不知是何原因？”王珪说：“古代帝王治国，大都崇尚清静无为，以百姓为中心；然而近代的君王，却以损害百姓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私欲，所任用的大臣也不再是

饱学经史的儒雅之士。汉代的宰相，没有谁不精通一种经书的，朝廷如有解决不了的疑问，都会引经据典，参照经书进行决断，于是人人懂得礼教，国家太平安定。但是近代却重视武功，轻视儒术，或用刑律治国，从而导致儒术受到破坏，古代纯朴的民风也就荡然无存。”唐太宗听了，深有同感。从此，官员中凡是精通儒学，懂得治国之道者，都得以提拔并委以重任。

唐太宗善于听取谏言，特别重视用儒家伦理教化方式来治理国家。这点非常难得。孔子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一般领导者都会因看到严刑峻法迅速的成效，而忽视道德教育。唐太宗却深信圣人的教诲，这也是他能够创建“贞观之治”的重要原因。唐太宗希望不仅与群臣探讨治国经验，而且能随时翻阅古圣先贤治国的教训。于是他命令谏官魏征及虞世南、褚亮、萧德言等，整理从五帝到晋朝几千年间治国理政的史料，将其中修齐治平的精要，汇编成书。

贞观五年，《群书治要》编纂完成。魏征在序文中称赞其历史价值：“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可见，《群书治要》是一部鉴往知来的治世宝典。唐太宗认为这部书广博而切要，日日手不释卷地阅读。他希望运用古圣先贤的智慧把大唐治理安定，而且为天下做出一个“善治”的示范。

唐太宗的治国成效

受《群书治要》的影响，唐太宗以能用贤纳谏、尊儒重道、勤政爱民而著称。他以文治天下，厉行节约，使百姓休养生息，很快便出现了国泰民安的局面，开创了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

《贞观政要·论政体》记载，贞观七年，唐太宗和魏征漫谈自古以来治理国家的得失时说：“如今大乱之后恐怕不能迅速实现大治。”魏征说：“并非如此，大凡人在危难困苦时就忧惧死亡，忧惧死亡就盼望天下太平，盼望天下太平就容易教化。因此，大乱之后更易教化，正像饥饿的人对饮食更易满足。”

唐太宗说：“贤明之人治理好国家尚且需要百年之久，才能消灭残虐，废除杀戮。大乱之后要想大唐，怎么可能在短期内做到呢？”《论语》中说“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所以，唐太宗认为，要恢复太平，即使是贤明的人来治理，也需上百年。魏征却说：

“这话是对一般人来说的，并不能用在贤明之人身上。如果贤明之人推行教化，上下同心，就会像响之应声那样迅速。事情不求迅速，也会很快推行下去。一年就能见成效。”

唐太宗认为魏征说得有理。但封德彝等却说：“夏商周三代以后，百姓逐渐浮薄奸诈。所以，秦朝专用严刑峻法来治国，汉朝以仁义杂用刑法治国，都是想教化好百姓，但却没有成功。怎么说是可以教化，却不去教化呢？如果相信了魏征的话，恐怕要败乱国家。”

魏征说：“五帝三王治理国家，并没有把百姓换掉，但他们仍能够把百姓教化好，可见施行帝道就成其为帝，施行王道就成其为王。关键在于，当时的治理者是否施行了教化而已。读古书记载可知，黄帝与蚩尤作战七十多次，天下大乱，而胜利以后，天下很快太平；九黎作乱，颡项出兵征讨，平定以后，仍不失其为治世；夏桀昏乱淫虐，商汤将他赶走，但在汤统治之时，就实现了太平；商纣荒淫无道，周武王便起兵讨伐，但到了武王的儿子成王时，也实现了天下太平。如果说百姓日新浮薄奸诈，再也不会淳朴，那么到现在这百姓都应该变得和鬼魅无异，还能实行教化吗？”

封德彝等人无法辩驳，但坚持认为魏征的建议不可推行。魏征引经据典，终于说服了唐太宗。唐太宗坚持推行教化，毫不懈怠。结果几年之间，天下康复安定，突厥也被打败而臣服。

唐太宗对群臣说：“贞观初年人们颇有异议，认为当今不能搞王道，施行道德教育、圣贤教诲，只有魏征劝朕推行。朕听了他的话，不过几年就达到中原安定、边远外族臣服的结果。突厥从来就是中原的强敌，如今突厥首领却佩刀值宿来做警卫，部落也跟着穿戴大唐的衣冠。朕能取得这样的成就，都是魏征的功劳。”

可以说，贞观盛世的创建，与唐太宗运用《群书治要》的理念，以身作则，重视道德教化，并制定了一套合情、合理、合法的政治体制密不可分。不仅如此，《群书治要》被日本人从唐朝带到日本后，被日本历代天皇及皇子、大臣奉为圭臬，成为学习中华文化的重要经典。



18 世纪英国怎么看中国园林

□ 胡森森

18世纪是中西文明交流的黄金时期。随着17世纪法国耶稣会士陆续入华，中国的礼仪、法律、制度、科技等知识传播到欧洲大陆，成为欧洲启蒙运动的催化劑。孔子的儒家精神，刺激着西方人走出神学时代而步入启蒙，同时中国的器物、艺术乃至抖空竹等民间游戏都进入了西方并产生了持续影响。在艺术品和器物领域，西方人爱不释手地把玩欣赏中国茶具、屏风、扇子，中国元素影响到教堂、花园和室内装潢的艺术风格。

打破古典主义回到自然风致

在“中国热”中，中国园林的一些特点以文字和装饰画的方式传入了欧洲，在整个欧洲引发轰动，这一时期古典主义的巴洛克艺术渐趋衰亡，而洛可可艺术在“中国热”的推动下风靡一时。在英国，经过坦普尔、艾迪生等人的介绍和坎特、勃朗等人的设计，中国园林同英国人对自由无束景象的热爱融汇起来，产生了所谓“自然风致园”，特点是将花园布置得像田野牧场一样，就像从乡村的自然界里取来的一部分。

中国园林在英国掀起了园林热。从当时设计的叠石假山、山洞拱桥以及18世纪坎布里奇和沃尔等建筑师留下的文字中可以推断，18世纪上半期英国出现的自然风致园受到中国园林较大影响。

巧夺天工赏心乐事

18世纪后半期，中国园林的影响进入第二阶段，钱伯斯爵士依据中国园林风格设计的“丘园”是“图画式园林”的典型代表，甚至开始援引中国园林来指责自然风致园。

欧洲人对于中国园林的了解渠道还不多，王致诚写于1743年的信件介绍了位于北京海淀的畅春园、圆明园、绮春园和长春园。王致诚以画家的眼光发现了中国园林的自然天成之美，宛如“大自然那鬼斧神工的杰作”，没有笔直的甬道，而多是弯曲的盘旋路和羊肠小道。这段文字在进入欧洲后，对当时的园林建造观念造成一定的冲击。王致诚的介绍十分详尽，且初步涉及中国园林的某些美学特征，遗憾的是未能深入揭示中国园林背后的某种精神，回答“中国人为什么要这样建造园林”的问题，未能揭示中国人如此运用写意技术的真谛。

不过，《中国杂纂》中收录了两篇韩国英的信件，可以看到他对中国园林有更深入的认识。韩国英也是一位

画家，据说他同一个叫刘舟的中国人切磋过中国造园艺术。韩国英的闪光点在于第一封信，他翻译了司马光关于“独乐园”的长诗，并附上他本人的一篇短文介绍中国园林；第二封信题名为《论中国园林》，概述了中国造园史和造园艺术的原则。

也许受刘舟的影响，韩国英试图用中国人司马光的作品来解释园林的功用，但他用诗体译成的这首《独乐园》的长诗，却不见于司马光的各种诗文集，与其意思接近的是司马光的散文《独乐园记》。《独乐园记》中确有一段话表达出重视独处与静思的念头：“明月时至，清风自来，行无所牵，止无所柅……踽踯焉、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间复有何乐可以代此也。因合而命之曰：‘独乐园’。”韩国英在《论中国园林》中强调中国园林对于心灵宁静的营造：“还要想到，人们到园林里来是为了避开时间的烦扰，自由地呼吸，在沉寂独处中享受心灵和思想的宁静，人们力求把花园做得纯朴而有乡野气息，使它能引起人的幻想。”由此看来，他应该是读过司马光《独乐园记》原文的。

传教士对园林艺术的介绍缺乏相

应文学的支撑，也就使得中国园林的真实面目被西方人有意无意间误解。英国人选择中国园林作为自然风致园的模板，也经历了一定的文化过滤和改造。在法国传教士对于中国园林的相关文学作品保持沉默的前提下，英国人却经由中国园林强化了自身对于“荒野”的迷恋，甚至将中国园林与恐怖、惊异乃至崇高这样的审美心理联系在一起，掀起了一阵“误读的盛况”。

中国园林之美

相比于同时时期的古典主义法国，英国更为重视感性和自然的因素。但英国人心中的自然与中国人的自然不太一样，英国人更迷恋“荒野”的气氛，强调野趣、自由、奔放甚至有些恐怖的场景，对于大自然的迷恋与神话、传说、显赫的历史结合在一起，在狂放的自然中完成对于个体自由的确认；中国人则关注“天人合一”“物我合一”这样的和谐境界，追求的是“物我两忘”“陶然共忘机”的和谐状态。

在18世纪，英国人却没有注意这个差别，从坦普尔到钱伯斯，这些英

国造园家从未看过真正的中国园林，而是从自身传统出发，对于中国园林做出了种种臆想和推断。钱伯斯在1757年出版的《中国建筑、家具、服装和器物的设计》一书中，开篇指出中国园林的基本特点：大自然是他们的仿效对象，他们的目的是模仿它的一切美丽的无规则性；中国园林重视整体、剪裁和提炼等特征。但论到园林中“景的性情”的分类，他说，“他们的艺术家把景分为三种，分别称为爽朗可喜之景、怪骇惊悚之景和奇变诡谲之景”。这一点则是他者的眼光，需要中国人进一步去理解。

所谓的“怪骇惊悚之景”，中国园林中即使有，也应该是极少数的另类，大概只存在于钱伯斯的想象中。这样强调恐怖，其实就是英国人乃至整个西欧文明对待荒野的既恐惧又迷恋的集体无意识。这种西式思维，根源于从朗吉努斯再到博克等西方哲学家对于“崇高”与“优美”的二分。

博克认为“惊惧是崇高的基本原则”，他在1756年发表的《论崇高和美的观念的起源》中，对崇高下了如下定义：凡是能以某种方式适宜于引起苦痛或危险观念的事物，即凡是能

以某种方式令人恐怖的，涉及可恐怖的对象，或是类似恐怖那样发挥作用的事物，就是崇高的一个来源。钱伯斯毫无根据的臆想却引起了博克的注意，1758年，博克自己主编的《年鉴》中甚至转载了前述1757年钱伯斯的那篇文章，试图将钱伯斯描绘的“怪骇惊悚之景”作为例证纳入到自己对于自然界崇高之美的理论体系中。正是在种种奇特的转译与文化误读之下，中国园林成为了“崇高”美学风格的化身。

中国园林的本来面目更接近于“优美”而非“崇高”，它有着洛可可艺术式的优雅与日常，不是靠惊骇与恐怖来征服游园者的，而是孕育着悠久的文人雅致，这一点英国人很难一下子理解。

在中国园林影响最大的英国，18世纪的模仿热潮中存在着对于中国艺术与文化精神的严重误读，将其特征定位为崇高与惊悚，显示出了巨大的文化隔阂。在此隔阂之下，西方完成了一次对于中国和远东艺术的想象。园林的实质是文人化的艺术，是中国文人寄意山水田园、寻求自然雅趣的结果，中国诗词歌赋中遍布对于田园、山水、风景与归隐生活的赞叹，倘能多为西人所知，当不至于郭书燕说到如此地步，也会少一些在历史细节面前怅然若失的遗憾。

